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6）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

人们提到高等教育制度，自然会想到大学，大学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牛津、剑桥这两所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大学，与美国的哈佛大学相比，都有着良好的国际声誉。但是哈佛的历史却短得多，只有两三百年，而牛津、剑桥的历史却要追溯到中世纪初期的 12 世纪了，那个时代的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又怎样呢？

还是让我们把视野先拉回到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公元 5 世纪吧！

公元 5 世纪，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古代的各种教育机构也荡然无存，征服欧洲西部的野蛮愚昧的日耳曼人，他们文化起点低，又不重视文化教育。当时西欧各地区的统治者如国王、贵族、领主、骑士等多是一介武夫，文教方面一片空白。而当时的罗马基督教会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实行严密的文化封锁，推行愚民政策，仇视古典文化及有关社会、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鼓吹神话和迷信，宗教蒙昧主义盛极一时，文化科技显著落后。例如教皇格里哥利一世便说过：“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下令焚毁罗马一所藏书丰富的古老图书馆，在人类文化史上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西欧经济、政治迅速发展，迫使教会不得不改变愚民政策。为了维护教会统治，教会兴办了一些修道院、教区学校，培养教士和僧侣。最为著名的是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480～548 年）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的教育活动。这样逐渐形成了包括语法、修辞、辩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的“古代七艺”，但这些已不再是古典文化的杰出成就，目的是为当时的宗教活动和教会统治服务。公元 8 到 9 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768～814 年）一度统一西欧大部分地区。查理曼公开承认由于日耳曼先辈的忽略，文化教育工作已经被人忘记。查理曼大帝大力提倡文化教育，改进教会学校。学者阿尔昆、马拉斯等人使欧洲的学术教育中心从地中海沿岸扩展到高卢、日耳曼、不列颠群岛等地区。后来的盎格鲁萨克森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871～900 年）、神圣罗马开国皇帝奥托一世（936～973 年）也提倡改革文化教育。但是当时的文化教育只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也只限于传授基础知识。

11 世纪末到 12 世纪，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工商业的繁荣，形成了许多工商业中心城市，新城市也大量涌现，推进了西欧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进展。兴盛的手工业、商业、银行业和人们的生活、生产、社会活动都迫切需要更多的文化知识。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眼界也日益开阔，社会也有一定财力供一些人学习、研究各种文化科学知识，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势在必行。

在分割细小的领地上，教权和俗权不断展开斗争，对手工业和商业缺乏统一管理的能力，于是各种手工业的同业行会和商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成为控制城市的力量。行会为了争取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权力和封建主展开持久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许多行会甚至整个城市夺得了自治权。行会得以进一步发展，组织和规章制度也日趋严密，这些就为大学组织形式提供了杰出榜样。学生行会和教师行会成为最初的行会机构。西欧城市中各种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为中世纪欧洲社会大学的兴起奠定了组织基础。

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得西欧和外界的接触更加频繁，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交流。11 世纪末到 13 世纪，多次带有侵略性质的“十字军

东征”，使西欧接触了先进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许多学术典籍也传入西欧。许多古典文籍和阿拉伯文献也被译为拉丁文，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动物学》；另外还有柏拉图、欧几里德、托勒密（天文学）、希波克拉底斯和盖伦（医学和哲学）、阿威罗伊（哲学）等人的著作。这些传入的代数学、化学、天文学和医学带来了西欧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重大革新，为大学的各个学科形成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哲学，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在风起云涌的异端运动和人民反封建斗争面前，那些圣徒奇迹、迷信故事，直至罗马帝国后期以来的教父学已不能完全欺骗人民，适应封建时代统治需要的经院哲学乃应运而生。因在教会学院里讲授，故名。其代表人物是阿奎那斯。经院哲学把许多问题混杂在一起，无所不包，从它开始，许多学说应运而生。经院哲学本身也有各派的争论。以安瑟伦（1033～1109 年）为代表的唯实派和以洛色林（1050～1106 年）为代表的唯名派是其中两大派别。其后又由法国学者阿贝拉（1079～1142 年）激起了论战的热潮，他在争论中大胆提倡“怀疑才能开辟研究的道路”、“怀疑无罪”、“只有研究才能得到真理”、“要信仰必需先对其了解”、“教义要经得起辩驳”等观点。

经院哲学内部展开的唯心论、唯实论两派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王权与神权、市民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斗争。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即：一般（或共相）究竟是否是在个别具体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

一般概念是否仅仅是具体事物的名称？

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还是个别事物先于一般而存在？

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一般概念不过是一个名称，属唯物主义范畴。

唯实论（又叫实在论）则认为一般是实在的，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是由一般派生出来的，因此它比个别事物更根本、更实在，它是上帝创造个别事物所依据的原型。唯实论属客观唯心主义范畴。

这两派的斗争，开拓了近代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先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而早期的经院哲学家们则整年累月地在寺院、学院里谈经论道，既不研究自然万物，也不接触社会，皓首穷经，咬文嚼字。他们之间也有争论，讨论一些荒唐而又可笑的问题，如“天使吃什么？”“天使要不要睡觉？”“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多少天使？”“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斯认为宇宙是按等级阶梯来安排的，并非生物体开始，上帝是最高级的，一切事物的归宿，以此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是自然合理的，如若有人想改变上帝关于社会等级的安排，便是犯下了弥天大罪。

中世纪初期，西欧古代的法律传统也因外族的入侵而破坏殆尽，而入侵各族各有各的法律传统习惯，这样就给西欧的法律带来混乱局面。虽然依据传统的法律习惯形成了“普通法”体系，但不能满足西欧政治、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发展中的工商业、复杂变化中的商品、信贷和财产转移关系，正在广泛建立的行会、商会和自治城市，迫切要求制造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培养法律工作者。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527～565

年）编纂了《民法大全》，以严格完备的体系对财产所有权和转移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同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的开展也成为迫切的课题。12 世纪初，爱纳里乌斯在意大利波罗尼亚讲授罗马法，名声远扬海内外。在爱纳里乌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和影响下，以教授法律闻名的波洛尼亚大学产生了。罗马民法的形成，使教会统治者们坐卧不安，随着他们在西欧社会势力和财富的日益增长和膨胀，教会法体系也逐步形成，出现了并立的教会法庭和世俗法庭。教会法庭拥有处理诸如理想信仰、婚姻、继承、教士、教俗争执等方面的专门权力。波罗尼亚的僧侣革拉在 1142 年编纂了《教会法会集》，从而也把教授教会法推向权威的位置。罗马民法、教会法、普通法在裁判中既互为补充，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彼此水火不相容。法学的教学分为罗马法和教会法两个系统。

在传说中，耶稣就是为人医病的人，医学也较早得到发展。中世纪初期的医学都和巫术迷信混在一起，同时也部分借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医学著作。11 世纪末叶以后，阿拉伯的医学大量传入西欧，使西欧医学得到较大的发展，阿拉伯著名医生阿维森纳（980～1037 年）的医学著作被人们奉为经典。在意大利南部，由于长期同拜占庭和阿拉伯接触，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医术得到保存。滨海城市萨莱诺，风景幽美秀丽、气候宜人，盛产矿泉，成为病人和负伤者的疗养胜地。医学学校在中世纪初就已设立。11 世纪末和 12 世纪初，犹太学者康斯丁努斯·阿非利加诺斯在萨莱诺翻译阿拉伯人的医学著作。阿拉伯的医术传到欧洲逐渐地形成了萨莱诺大学，这是第一所医科大学。大学里讲授希波克拉底斯（古希腊医生）、盖伦（古罗马医生）和阿维森纳的著作及尼古拉斯的《消毒述要》、伊萨克的《饮食篇》。医学教学在西欧大地逐渐扩大，又产生了外科和解剖学的课程。

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的兴起给大学的创立和发展铺平了道路。自由城市和大学，成为中世纪末期的文化特色，也是自由和进步的象征。

波洛尼亚大学　在城市与行会组织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了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欧洲“大学”原来的含义是人们组织起来的团体，逐渐发展为专指由从事学习、教学和研究的人组织起来的团体。在以后的形成过程中，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含义，指并非专由一个地区或一个阶层团体的学生，而是由各个地方来的学生组成的学校。从事着神学、法学和医学等的高等教育。

11 世纪的沙里诺大学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创立了学位制度，波洛尼亚的史得夫达摩格内拉耳是大学制度最发达的地方。波洛尼亚大学首先开办了数个学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波洛尼亚大学的起源是学习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学生组织。波洛尼亚所在的伦巴德地区是西欧和东方贸易的通道，有发展的工商业和大批的自治城市，有利于学术研究，欧洲各地的学生纷纷前往求学。但是维护本地人利益的行会规章和法律对外来学生极为不利，学生在房租和学费上受到敲诈，有的人还欠下债务。这样学生们形成了自己的团体，并制定规章来保障自己的学习和聘请教师。学生考核老师的教学水平，规定奖金和授课时间，教师上课一律不能迟到，一节课不能吸引五个学生的老师将被解雇。只有学生团体认可在学识和讲授方面合格的老师，才有资格向学生进行考试，并授予证书。学生也同城市当局协商房租，限制高价。波洛尼亚大学是西欧第一所制度完备的大学。

学生团体取得巨大的成就原因有：一是团结、林立的行会，法规纷杂，

不得不让步；二是学生多是富家子弟和教会资助的教士，是城市的经济来源，教师也要从学生团体得到可靠收入；另外罗马皇帝和教皇权利争夺异常激烈，都想笼络具有法律和其他学识的人才。1158 年，皇帝腓特烈一世，外号红胡子，名字叫巴巴罗萨（1941 年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旨在对苏联进行侵略扩张）批准大学自治的法律地位，1189 年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又保障学生租房居住租金协商的权利，大学生可以自由通行，当局不得阻拦；大学审理学生与外人发生的诉讼；大学师生可以不交赋税，不服兵役。

学生人数增多，学生团体又分为“同乡会”，一共十四个，同乡会原则是互相保护、帮助、共同娱乐。同时又要求纯洁、友爱、照顾病人，救济贫困者，防止打架争吵，埋葬死者，互相帮助研修学业，援助被迫的人，交纳会费，重大问题派代表共同商议。后来团体共同选举了校长，校长具有司法权力，校长必须服从缔结的章程，宣誓遵守章程。这种组织形式保障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只要被学生团体聘任和判定合格的教师才在组织之内，这个组织不干涉教师教学、考试和学术活动。

波洛尼亚大学备受斗争的考验，对象包括当局、贵族、教会及师生内部。形式包括司法斗争、武装自卫、罢课、罢教、大学集体迁移种种。13 世纪初，波洛尼亚大学已有五千余名学生，1316 年增设了医学，1360 年又增设了神学，成为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大学的榜样，大学法律教育的影响也遍及西欧各地。

波洛尼亚大学是欧洲最早的法律学校，由于伟大的教育家和法律家仪耳尼宙斯的缘故，名声大噪。此校由于新颖的教授法和法律研究的革新，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求学。中世纪欧洲各地的学校大都以波洛尼亚大学为范本而制定个别的规章。如德国和西班牙的许多大学，其中著名的有雪维黎亚大学和利耳达大学。1243 年创设的撒拉孟卡和 1364 年创设的古拉可夫大学、蒙特利亚大学等，也以波洛尼亚大学为榜样。波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到意大利各地讲学游说，设立了许多学校，包括 1204 年创立的派珍芝耳大学，因学生们的移动而产生的维耳佳利大学，1188 年比利耳从波洛尼亚迁移到摩内拉而创立的大学，等等。

由于波洛尼亚大学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为了便于交通，而在拿玻里创立了学问研究中心；1244 年腓特烈二世又创设了一所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是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又一个典型。查理曼时代，巴黎就有教会和宫廷学校，此后有几个著名的教堂和修道院学校，特别是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学校一直持续发展。由于经院哲学中的唯名派和唯实派的争论斗争，巴黎成为研究学习和讨论最集中的地方。过去的宗教教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要求接受文艺学科、哲学、神学和教会法的教育。最先，由教会学校的校长颁发许可证，但是校长们对各科知识不太了解，却以谋取暴利为目的出售许可证，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学者的名誉和权利。为此，各教会学校的教师群起抗议和抵制。1179 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通谕严禁教会学校校长颁发许可证，责令其保证教学人员的质量。这样，要取得教学资格就主要取决于教师团体的“授职”，而巴黎的教师和学校声誉和地位很高，西欧各地求学者纷纷而至，以取得教师团体的授职。教师团体迅速强大起来，并经常与巴黎市民发生冲突。于是，教师团体向亚历山大三世请愿取得了由教师审判有关学生的法律案件的特权，实际上是一个由教师专门组

成的法庭审理。1194 年，教皇西斯廷确认了这一权利，巴黎大学所有师生都处在教会法管理之下。 1200 年，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正式承认巴黎大学的特权。教师团体将过去的习惯和规章写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它成为处理各类法律事务的法人团体，使用专门印章，主教学校校长的权力被彻底排除，1231 年教师和学生又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取得了独立于当地教会的自治权。当时处于最高峰的罗马教廷企图利用巴黎大学，对法国的教会和俗权加以控制，巴黎大学也汇集了西欧许多有权势、有学识的教士，权倾西欧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是巴黎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的学生，正因为这些原因，巴黎大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巴黎大学中，文艺学科教师团体人数最多，在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文艺学科教师团体组成法兰西、皮卡迪利、诺曼底和英格兰四个同乡会。教师更上一层的组织是分学科的教授会，包括文学、神学、教会法学和医学四个教授会。教授会有权颁发各自学科的教学许可证，决定自己的教学规则和学生纪律，巴黎大学的重大事务由几个教授会共同协商。13 世纪末，文学教授会会长拥有较多人力、财力，实际上已成为巴黎大学的校长。

巴黎大学教师团体主持学校事务的体制，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北欧各大学的榜样。1162 年，仿照巴黎大学的体制，由巴黎来的教授们创立了牛津大学；1209 年，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又设立了剑桥大学。

巴黎大学闻名于西欧中世纪，最盛时期学生达到 4～5 万人，当时，巴黎大学号称与教皇和皇帝并驾齐趋为欧洲三足鼎立的强大势力，特别是文艺学科的经院哲学，更是闻名遐迩，最为著名。另外，巴黎大学在神学和宗教事务上的权威和影响也非常大，在 14 世纪由于罗马教廷分裂为东罗马、西罗马教廷，势力大减，巴黎大学凌驾于教皇之上。巴黎大学中形成了强大的宗教保守势力，其团体一直延续到欧洲的近代时期，其影响则更为深远。

英国牛津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是西欧中世纪大学中的又一特别典型。

中世纪初期，一些学者就来到牛津讲学，1167 年左右，英王亨利二世和法国国王发生争执，许多英国的教师和学生陆续从巴黎大学回到牛津。这些回到国内的教师和学生按照巴黎大学的组织方式讲学，牛津大学形成了。

牛津不是工商业、政治和教会的中心，正因为这样，教师、学生的研究学习和生活必须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加以保证，于是形成了学院制度。学院制度在西欧的大学中早就存在，最初是为那些付不起房租的穷学生提供宿舍，后来逐步成为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的组织。而牛津大学的学院成为大学体制的主要形式，牛津大学正是因一个个学院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学院订章程，由国王和教会当局批准，包括尊重捐献者的意愿，服从某个教俗上层的领导，教师团的形成，院长的产生和权力，经费的运用，学生的学习规章和纪律，等等。学院拥有招收师生、经费运用和进行教学各方面的自主权，也拥有学生和教师宿舍、教堂、食堂、教室、图书馆和庭院。牛津大学的重大事务由各学院院长会商，并轮流分工负责。由国王和教会任命的校长主要是负责大学独立的司法权。学院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为许多贫困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学习、生活的保障，而且使各种教授、学习和管理制度能够系统化和贯彻实施，还为大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来源，使大学不仅在司法上，并且在经济上也加强了独立性。

尽管牛津大学处在小城市里，但也经历了长期斗争的考验，大学与城市当局和市民常有争斗，甚至发生多次武装冲突。1209 年，一次武装冲突使牛

津大学的师生离开了牛津，逃散的一部分师生跑到剑桥，后来逐步形成了剑桥大学，在大学和市民的冲突中，国王和教会支持大学。国王在 1244 年、1248 年、1275 年一再颁发保护牛津大学权利的特许状。1355 年大学最终战胜城市当局，成为牛津的掌权者。

牛津大学虽然学院林立，制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教师们还是形成了严密的组织来管理大学。来自英国南方和北方的教师分别选出了两个学监，学监后来拥有了指派各学科的教师代表选举校长的权利。全体教师又逐步形成教师会议，大学由教师会议提出和修改学校规章，讨论决定重大的财政收支，总管授予学位事项。由于教会和修道院团体干涉大学的教学，教师会议多次和他们展开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

牛津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有着重大作用。牛津校长格罗塞特和学者罗吉尔·培根跟教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先开展对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我们这里提醒读者朋友，欧洲中世纪文化史上有两位培根。罗吉尔·培根是一位侧重实验的先进思想家，生于 1214 年，死于 1294 年，因为他还大胆地揭露了教皇和僧侣的荒淫无道，指斥教会是欺骗与谎言的渊源，因此，被视为异端，遭到教会的严重迫害，被囚禁达 14 年之久。另一位培根后面将提到。

邓斯·司各特和威·奥卡姆也发展了唯名论，对抗罗马教会的正统神学，成为欧洲中世纪学术界对教会的基本信仰和理论最严重的挑战。约翰·威克里夫突出的历史贡献，则是把《圣经》转译成英文，使英国人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为英国宗教改革运动，提倡国教，以摆脱罗马教廷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欧洲在中世纪所创立的大学，各有各的特点，不能概而论之。但是他们不乏相同之处。

中世纪西欧没有系统的小学和中学教育，进入大学前，学生一般要在教会学校和后来的城市兴办的文法学校学习基本的读、写、算术和宗教教育，特别是要初步掌握拉丁文。拉丁文是大学教学和生活交际中唯一通用的语言。学生一般在 13—16 岁之间就可以进入大学。开始，大学的纪律管理非常松弛，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组织和设备的完善，尤其是学院的设立，大学有了严格的制度和纪律。学生要到固定宿舍住宿，早上五、六点钟按时起床，共同在食堂就餐，参加礼拜，按时上课，闭门自修，只有在一定时间才可离开学院外出。有教士身份的学生和教师要求独身不婚，一些贫困学生也允许乞讨进行学习，青年学生经常举行球赛、打猎、舞会、音乐等活动，但这些活动均由学生自行组织，而不是当时大学认可的。

大学的教学逐步系统化，大学最初的二年或四年，是以教师讲解辅导教材为主，每次上课长达三小时，每月有课一到两次。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答辩的份量也越来越多。有通过由相当高资格者组成的教师团体的主持，并有相当多权威人士旁听的答辩，才能取得学士、硕士或博士的资格。学生在毕业前，通常要进行两次考试，其中之一为“学位认可考试”（licentia），由于它与教授资格证书无关，因此不受重视，徒然流于形式。另一种考试，类似今天的能力测验，即所谓教授甄试（conventatio），这个考试相当于教授资格评定。只有通过第一种考试的人才能继续参加教授甄试。考试大都在教会里举行，成绩公开发布，由教授团的代表，即主考官（Promoteur）宣布及格名单，并赠予及格者一些书籍和顶无檐帽，作为荣誉的象征。学生必须在修业年限届满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民法为八年，教会法为六年，医学

和其他选修科目（如艺术等）均为四年。学生也必须在公开的讲座会和实习后，才能参加考试。但由于学校的增加，学校为了拉拢学生，保证学生数量，这些规定也逐步被废除。

大学里学生们学习什么呢？

文艺学科是基础科目，包括中世纪初期的“古代七艺”，及后来增加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西塞罗等人的著作。

“古代七艺”指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七门学问。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古代学者的集大成者，他也有认识错误的时候。我们都已熟知的，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落得快，这一想当然的结论，确实符合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如石头比纸片、羽毛落得快，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人物尚未认识到空气阻力的存在，所以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并不足为奇。我们不应简单地嘲笑前人。托勒密是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天文学家，大约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里亚人，著有《天文集》（又名《地理学》），集地心说之大成，确立了地心说体系。他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谬说流传颇深远，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又认为地球是圆的，在 15 世纪初被译成拉丁文。地圆学说在欧洲的广泛流行，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西塞罗是古代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随着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它们成为文艺学科的高级课程。哲学又有自然哲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道德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形而上学三部分，基本上是以亚里士多德全集各书为教材。最初要求学习六、七年才能得到硕士学位，有了学士学位之后，一般学习四年可以得到。但是像神法、民法和教会法和医学，除了要文艺学科的基础，还需要长时间的专业学习，有的多达 16 年之久，由这些学科结业的也一般便授予博士学位（不一定要有学士和硕士学位）。原先大学要求穿戴教士袍服，由于有各个学位，因此产生了各种样式，授予学位也发展了隆重的穿袍、奏乐、游行和宴会形式。获得学衔的人，便有条件担任教师、法官、律师、公证人、高级教士和医生。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受到罗马教会神权的统治，不得不适应教会、教义、教条所定下的框架。尽管当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养成了良好的研读、注释、逻辑分析和推理、辩论的能力，并力争用理性来求取知识，认识世界，但总不能没有教会的宗教迷信的色彩，并具有教条和权威的局限性。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套在中世纪大学上的神学专制的枷锁出现了裂痕。而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大学里培育出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培根、哈维一批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哥白尼提倡日心说，反对地心说，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宗教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无稽欺人之谈，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诺坚持和发展太阳中心说，而被视为异端，即使宗教改革的创始人马丁·路德也骂他是疯子。为坚持真理，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却讥笑为“温和的，不流血的方法”。开普勒对天文学颇有建树，以其名字命名的开普勒三定律，至今仍是经典力学的基础内容。伽利略以其比萨斜塔的著名试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而为世人所熟知。这里所说的培根便是弗兰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的提出者，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其时代是 1561—1626 年，要比罗吉

尔·培根晚三个世纪。哈维是英国生理学家，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

欧洲社会人才辈出，为西欧走出中世纪以来科学领域的黑暗低谷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大学，特别是波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带领下，大学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群星灿烂，到 15 世纪末，整个西欧建立了近 80 多所大学。意大利有 20 所，法国有 18 所，英国有 2 所，苏格兰有 3 所，西班牙有 13 所，葡萄牙有 1 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包括尼德兰、捷克和瑞士）有 16 所，匈牙利有 3 所，波兰、丹麦和瑞典各有 1 所。大学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形成，并受到城市、行会、教会团体等组织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形成过程中，大学和那些组织和制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激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存在、发展、自主的种种权利。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这个伟大转变的时代，大学组织和地位有较大的变化。中世纪的社团和教会组织日益衰败，而大学的规模、设备、需求却日益扩大，这样旧有的对大学的经济政治支持来源已经不能胜任了。新兴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发达的城市共和国和领地的当局，开始以国家财政来直接支持大学。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加大学成为国家的巨大荣耀；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又是城市的骄傲所在；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图宾根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则分明是领地发达的象征；而克拉科夫大学、布拉格大学、哥本哈根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又是弱小民族独立自强的希望。大学的建筑辉煌，大学的规模也急剧增大，尽管专制王权和反宗教改革的势力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要给大学套上新的桎梏，但大学却冲破了重围，科学、文化的发展又向前历史性地迈出了一大步。大学的师生在后来的两、三个世纪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百倍于前人，触目辉煌。

追求真理，追求知识，追求得到改造社会和自然界的能力，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能力，作为人类进步的总倾向，是任何人物和事件所阻挡不了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大学这种组织为此提供了较为良好的条件，成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先导，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块巍然耸立的丰碑，不仅在古代、近代和现代，还要在世界的未来发出熠熠光彩。

哥白尼和《天体运行论》

他的前面，是千年的中世纪的黑雾，神学的光环笼罩着四方，使一切科学都变得暗淡无光。而从他开始，科学无情的利剑开始穿破神学的光环，开始有了新的开端。当他的追随者被宗教判决所烧死在罗马时，他及其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也如同罗马的火焰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烧毁了阿奎那和奥古斯丁建立起来的神学体系的支柱——托勒密的地心体系。

他写成了光辉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创立了新的学说，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随着它。他的《天体运行论》开辟了人类天文学的新世纪。

这个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就是波兰的科学家——尼古拉·哥白尼。

欧洲在进入了 14 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内,在思想文化或政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和重大发现，其中有三个最为突出：社会制度上向资本主义过渡；文艺复兴运动；新航线和新大陆的发现。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上十分黑暗，封建割据造成的城邦分裂对立，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为此，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断掀起反对封建贵族的腐朽落后统治的斗争。最后，由于依靠了广大市民和农民的力量，资产阶级打败了封建贵族，先后建立了统一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从而为代表了生产力更高水平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的波兰——哥白尼的祖国，也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各个方面都进入了辉煌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一切，为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夺权、变革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巨浪。它的发源地是意大利，不久就波及到波兰等欧洲国家。文艺复兴运动虽说是从学习古典文化和艺术开始的，但并非是真要复活古代文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从古典文化中发现了其精神基石——民主思想、探索精神和理性主义等，并以此为武器同宗教与经院哲学所宣称的禁欲主义作斗争。而在这斗争中，酝酿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思潮。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宗教、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在哥白尼生活的那个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已进入了高潮。

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西欧国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城市，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很快市场就饱和了。为了寻找新的市场，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通向东方的新航路。

1492 年，受西班牙国王资助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岛，他误认为那是亚洲大陆东岸，但多年以后，科学家才弄清哥伦布开辟了一条通往新大陆——阿美利加洲的新航线。继哥伦布航行之后，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开始了环球航行。他们沿哥伦布的航线到美洲后，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经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印度洋南部、非洲好望角而历时三年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绕地球一周的伟大航行。

新航线与新大陆的发现，在实践上有力地证明了大地为球形之说，丰富了人们的天文和地理知识，但同时也向天文学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这些无疑对后来哥白尼创立日心说新思想的酝酿、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尼古拉·哥白尼于 1473 年 2 月 19 日出生在维斯杜拉河畔的托伦城。他

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其国籍到底是德国还是波兰，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母亲是德国血统。父亲在 1483 年去世，哥白尼由他舅父抚养，舅父想叫他在教会供职。在托伦上中学以后，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学读了三年书。在阿耳伯特·布鲁兹乌斯基的教育下，他对数学和天文学发生了兴趣，并且养成了使用天文仪器来观察天象的习惯。在与他舅父一起过了两年之后，1496 年哥白尼去意大利，在随后的十年里，他先后在波洛尼亚、帕多瓦和斐拉拉三所大学里攻读。在这些年里，他学习的专业科目是法律和医学。虽然今天人们对他在意大利的活动知道得不多，但是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他在意大利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理论和实用天文学。

在他童年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他以后的作为极具影响的事。10 岁时，哥白厄不幸丧父，不久又失去母亲，而被他的舅舅瓦兹洛德抚养。瓦兹洛德学识渊博，才能出众，任瓦尔米亚地区的大主教。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与进步的知识界联系密切。当哥白尼在学校读书学习时，他常带哥白尼参加人文主义者的聚会，从人文主义者那里，哥白尼接受了当时进步思想的重要影响。瓦兹洛德舅舅的辛勤培育，使哥白尼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为他后来从事天文学事业，并取得划时代的科学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波洛尼亚期间，哥白尼与该校天文学教授多美尼哥·迪·诺瓦拉有密切的个人接触。诺瓦拉是在自然哲学中复兴毕达哥拉斯思想的领袖，这个运动当时正在唤醒意大利的各所大学。两人常在一起进行天文观测，并在一种哥白尼平时所看不到的自由气氛中讨论托勒密《至大论》的错误以及改进托勒密体系的可能性。勿庸置疑，正是在逗留意大利期间，哥白尼最早受到激励，立志改革天文学，后来在他隐退的年月里终于获得了成功。

当时，天文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托勒密是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他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进行了天文观测，在亚里士多德等前人的天文理论和自己的天文观测基础上，托勒密写成《天文学大成》，并提出了“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所有的天体——包括太阳在内——都围绕地球运转。由于托勒密主张的大地为球形与教会所持意见相反，最初教会也反对他的学说。但是，他所认为的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又符合《圣经》中的说教，并且教会利用这个学说，将它作为《圣经》创世说之一个例证，而成为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

最初，哥白尼并未认清托勒密地心体系的实质而接受了它，并企图对其中不足之处加以修补。但随着理论研究、天文观测的进行，使哥白尼愈发看出托勒密地心体系的破绽，甚至于支离破碎、混乱不堪。于是哥白尼决心从根本上否定它，以便来寻找隐藏在天体运动之间的客观规律，发现宇宙结构的新体系。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毕生的心血。

哥白尼从事于天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追求真理，打破神学和教会的垄断，开创了科学的发展，为人类作出了无私的贡献。哥白尼还强调指出，天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

为了创立科学的天文学理论，哥白尼首先要探索的问题是大地的形状，因为这是建立宇宙结构体系的基础。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对大地宇宙的形态描述是：宇宙是个类似于长方模样的箱子，箱子底是大地，它有四个角，原形的穹隆状盖子是天空，固定于箱子的四壁上，大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有人居住。天空的上方是天海，天海的上方是天国。由于当时的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对于地球表面的

海陆分布情况不太了解，因而很为之受惑。所以哥白尼认为对大地形状问题的科学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哥白尼对古希腊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很多学者对大地形状、宇宙形状进行了长期探索。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指出：球形大地悬于空中，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月光是太阳的反射光，这是惊人的创见！此外亚里士多德也在理论与实践上论证了大地是球形的。

在此基础上，哥白尼又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察工作和实际科学考察，并提出大地的形状是球形。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他列举了许多论据：当一个人向北走时，地球旋转的北极渐高而南极渐低，若向南走时则得出相反的结果。当驶入大海航行的船只，无论怎样行驶，船身总是先从观察者的视野中消失。这一结论，后来被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成功证实，从而在实践上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

从此之后，大地为球形的理论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它为哥白尼进一步进行探索宇宙结构的新体系奠定了基础。这是哥白尼创立“日心说”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哥白尼从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后，他已被任命为他舅父主管的教区内的弗劳恩堡总教堂的牧师。但是回国以后，他仍与舅父一起住在舅父在海尔斯贝格的邸宅，直到 1512 年这位主教去世。然后，哥白尼到弗劳恩堡总教堂任职，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余下的三十年，除了偶尔中断过而外。这三十年从表面上看，是哥白尼一生最平静的年代。他参与牧师会的事务，做了一点政治工作，还免费为这个地区的贫民治病。但是，正是在这些年里，哥白尼构想了他的行星系的细节，对大量复杂的计算作了整理（通过这些计算，这个思辨的体系终于达到了在数字上的精确），并且逐步地使手稿臻于完善，记载着他的全部劳动成果的这部手稿最后奉献给了世界。

哥白尼勤奋好学，获得了教会法博士的学位。但是他把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都放在天文学研究上，继续探索宇宙结构的新体系问题。

继在克拉科夫大学解决了大地的形态问题之后，他接着又考虑地球的运动以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哥白尼深知倘若这两个难题不解决，“就决不能得出什么可靠的天象理论”，为此他用大量时间，翻阅查找许多天文资料。但它们都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体系的理论资料，没有什么定义（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决计外出游历，寻师访友，以学习知识。

他首先拜访了著名天文学教授达·诺瓦拉，诺瓦拉是文艺复兴运动领导人之一，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影响，曾亲自进行了很多天文测量，对黄道倾角的测量，使他发现它在逐步变化，通过实践，诺瓦拉对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产生了很大怀疑。诺瓦拉发现哥白尼是个人才。便请他住到家中，耐心给他讲授天文学理论，还与他一起观测。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怎样用几何图形与数学表示宇宙的结构与规律，用以改造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这些对哥白尼产生了很大影响，哥白尼后来对天文学的伟大变革就是沿着诺瓦拉所指的方向前进的。

在帕多瓦大学，哥白尼向著名的天文学教授弗拉卡斯多罗请教。他建议哥白尼重读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著作。

哥白尼接受导师的建议，开始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作广泛的研究工作，希望从中能找到在天体运动方面与传统观点所不同的假说，而把创立宇宙结构

的新体系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一番辛苦地重读之后，哥白尼果真发现了与地心体系理论相反的见解——日心地动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费罗斯认为：球形的地球与太阳、月亮一样，在一个倾斜的轨道上绕着火运动。哥白尼激动地同意这关于地球运动的第一推测。后来，哥白尼又发现天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太阳为中心和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见解的人，他就是公元前三世纪生于希腊塞莫斯岛的阿里斯克。他明确地指出：地球和行星都以太阳为中心作圆周运动。地球每年绕太阳公转一周，同时，又每日自转一周，从而产生了天体的周日和周年的变化，这是一个惊人的见解。

哥白尼深为自己能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找到创立宇宙结构新体系的理论假设而高兴，但他并没有以此而去建立那新体系，向地心体系挑战。因为他深知古人的哲学思想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理、假设，一种天才的猜测而已。要把它变成为有说服力的现实、科学的学说，仍需进行大量的天文学观测和理论论证工作。

哥白尼根据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详细论证了“地动说”，驳斥了所谓的“天动说”。首先，他指出，由于大地和一切天体皆为球形，所以地球和天体必然作圆周运动，这种运动是球形所固有的性质与特点，既无起点也无终点。进而，哥白尼又根据物体运动的相对性原理作了进一步的科学解释。他说：“无论观测对象运动，还是观测者运动、或者双方同时运动，但不一致……如果假定是地球在运动，也会显得地外物体作方向相反的运动。”他又进而指出：“天体的周日运动也是这样，人们假定地球不动，天体每天绕地球自东向西转一周，同时，地球本身绕自己的轴心自西向东昼夜转个不停。”

哥白尼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地动”作了科学说明之后，又对托勒密等人所鼓吹“天动”而非“地动”的种种奇谈怪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就这样，哥白尼在导师的建议下，重读古希腊罗马哲学，又得到绘画大师达·芬奇的帮助，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观测之后，基本上弄明白了地球运动的问题，把他自己创立宇宙结构的新体系的研究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506 年，哥白尼回到波兰后，为照顾年老多病的舅舅而留在利兹巴城堡住下来，并正式开始了《天体运行论》的写作。6 年后，他舅舅去世，哥白尼便离去，到弗龙堡大教堂任职。在弗龙堡定居后，哥白尼买下城堡西北角的一座箭楼作他的宿舍兼天文观测台。箭楼有三层，最上层的窗口可向四面八方观测天象，平台适宜作露天的观测。但由于该地区纬度太偏北，而且近波罗的海而阴湿多雾、星相模糊，为天文观测造成了困难，只有严寒的冬天，才适宜于观测天象，于是每逢冬季，哥白尼便冒着严寒在露台上通宵达旦地观测。

哥白尼动手自制了许多观测仪器，一种是测行星距离的“三弧仪”，一种是测太阳中天时高度的“象限仪”，还有一种是测天体在天空任何处高度的“三角仪”。虽说他自制的观测仪器十分粗糙和简陋，观测技术也无法与现代人相比，可他的观测结果十分精确。

哥白尼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观测天象，是为了使自己创立的新学说符合客观实际，用观测的第一手材料充实、修正其学说。但就在这长期观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行星应当有一个共同旋转的中心，这个中心不是地球

而是太阳。这些新发现，为他写作《天体运行论》，探索宇宙结构的新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准确而有价值的材料。

1515 年秋天，正当哥白尼继续进行天文观测并全面展开了《天体运行论》的写作之时，波兰北部的条顿族骑士团进犯波兰边境，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受命前去边境守卫庄园，注意来犯之敌，尽管如此，他也没有中断天文观测与写作工作。

3 年后，他结束任期回到弗龙堡，正准备集中精力加快《天体运行论》的写作时，战争爆发了，哥白尼亲临前线守城，激战数日而击败敌人的进攻，为此他被国王推举为瓦尔米亚主教区的行政总管。一上任，哥白尼便热情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在此期间，他研究了关系到人民经济生活的货币问题，认为与宇宙天体运行有其客观规律一样，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货币亦有其客观规律。

在战争过后的情况下，为了消除各国货币非常混乱的局面，哥白尼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成立“货币同盟”。主张参加货币同盟的国家只发行一种货币。并规定每个货币含有一定量的黄金或白银，同时将各国以前发行的贬值货币一律收回销毁，不得再混入流通领域。这一理论的提出比英国金融家格雷欣早了几十年，这也是哥白尼为世界金融货币所做的一个贡献。

1521 年后，哥白尼利用战后的平定全力展开《天体运行论》的写作。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宇宙的中心问题，这是哥白尼宇宙天体结构新体系——“日心说”的核心与灵魂。而“地心”还是“日心”两大天文学派、两种世界观争执已久。而从亚里士多德到托勒密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余的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转。在哥白尼之前的 14 个世纪里，“地心说”占据了牢固的统治地位。倘要打破这种传统观念、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这在当时会被看作是一个荒唐的举动。

极具开拓新道路和勇于打破传统观念的哥白尼，决心抛弃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错误观念，去探求真理。

哥白尼首先从观测宇宙天体现象入手，努力地探索宇宙天体的规律。

根据他的观测成果及对此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如果说地球还能有别的运动，那就一定是与其他行星一样的运动，即围绕太阳中心的运动。由此，他得出一个新结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正如人们所说，只要‘睁开眼睛’正视事实的话，就会看到星体的合理秩序与宇宙的和谐。”

哥白尼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通过观测实地测定了行星的公转周期，重新安排了太阳系诸天体的排列顺序。他指出，太阳系的行星在各自的圆形轨道上绕太阳旋转，其轨道大致在同一平面上，公转方向也一致。按照周期与轨道大小成正比的观点，哥白尼重排了天体由远及近的顺序，即：最远的恒星天球是其他天体运动和位置的参考背景。行星是土星、木星、火星、地球、金星和水星（当时尚未发现天王星、海王星与冥王星）。

就这样，哥白尼正确地解决了宇宙中心这个最大难题，而使宇宙天体结构的新体系——“日心说”基本确定了起来。哥白尼之伟大是他把地球从宇宙中心地位拉了下来，正确的降为一颗普通的行星，使地球不断自转并围绕太阳运行，而彻底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粉碎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这是人类天文学史上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1530 年左右，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手稿基本完成了。他年复一年地不断修订他的手稿，而对是否发表这部手稿一直犹豫不决。然而，当他的

真正见解走漏了风声以后，便引起了议论和好奇；大约在 1529 年，他把《短论》的手稿在朋友中间传阅。这本小册子对他体系的描述很接近最后文本，但是所有计算都略去了。大约十年以后，哥白尼接待了年轻天文学家乔治·约阿希姆的长时间来访，后者研究了尚未发表的手稿，并以《概论》为题把它印出，让更广泛的人知道这手稿的内容。经过朋友和天文学家的传阅，使欧洲不少天文学家都逐渐了解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基本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天体运行论》定稿之后，哥白尼踌躇了很久时间没有发表。对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哥白尼担心著作一出版，会引起一批人的轻蔑、非难和攻击，而且会招致教会的残酷迫害。因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教会疯狂地迫害那些宣传违背《圣经》的“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的科学家与进步思想家。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哥白尼对教会的迫害和担心，并不主要是考虑自己的命运如何，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所创立的“日心说”的命运如何。哥白尼十分担心自己费尽心血换得的研究成果将被教会的愚昧残暴扼杀在摇篮中，而不能实现其夙愿——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奉献给祖国，奉献于社会，为全人类造福。正因为这样，他才决定慎重对待这一著作的出版。

在此期间，他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在他们的劝说与敦促下，哥白尼消除疑虑，他相信真理定会战胜谬误，正义定会打败邪恶，进步定会取代反动。为了追求真理，摒弃谬误，哥白尼毅然把《天体运行论》交付出版了。哥白尼充满信心地认为，它将会驱散笼罩在大地上的迷雾，得到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天文学家和一切敢于追求真理的人的欢迎与拥护。因此他说：“我毫不怀疑，有真才实学的数学家只要他们依照科学的要求，深入地而非肤浅地了解、鉴定我立论的依据，就会同意我的看法。”

这时，已经衰老多病的哥白尼在朋友们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将手稿托付给年轻天文学家乔治·约阿希姆去发表。这本书在纽伦堡印刷，于 1543 年出版，也就在哥白尼去世之前几个小时内，《天体运行论》印刷出来了。他带着一种安慰离开了人世。哥白尼奉献给人类的《天体运行论》是近代科学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不仅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产生一次新的飞跃，而且也宣布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到来。

哥白尼“日心学说”的诞生，标志着自然科学已经从神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宣告了宗教神学世界的破产，为科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在《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应，受到了那些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风暴洗礼的追求真理而敢于向传统的宗教神学挑战的天文学家和青年学者们的热烈欢迎。而《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却引起了教会的仇视和恐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拥护哥白尼学说，而反对宗教神学的谬论，1616 年罗马天主教会把《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并更加疯狂地迫害那些宣传、捍卫哥白尼学说的人。但是，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和青年学者接受了哥白尼学说，并为宣传、捍卫和发展它而与宗教神学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斗争。而迫使罗马教廷在 1757 年解除其禁令，准予印行。

哥白尼的日心学说广泛传播开来，尤其在实用天文学家中间。许多英国科学著作家都推崇日心学说，最先是约翰·菲尔德在 1556 年首开其端，还有威廉·吉尔伯特，他试图在他关于磁学的思辨与哥白尼理论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但弗兰西斯·培根反对日心学说。哥白尼体系之最终为科学界所接受，主要应归功于伽利略、开普勒和笛卡尔以及后来还有牛顿等人的权威。

哥白尼学说的最早拥护者之一是意大利思想家乔丹诺·布鲁诺（1548-1600 年），他当初是个僧侣，以后云游欧洲传授异教思想，为此他最后被宗教法庭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布鲁诺的著作包含为哥白尼天文学辩解的内容，但他比他的先师更进一步，抛弃了那种认为恒星固定在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晶莹的天球上的信念。他把恒星看作是散布在无限空间中的一个个太阳，成为无数个像我们一样的行星系的中心。

开普勒和伽利略等学者们，继续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通过理论研究、天象观测，而为哥白尼学说提供了证据，并补充和发展了它。后来，以哥白尼学说为基础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更对哥白尼“日心说”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随着光行差和恒星视差等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光辉例证的发现，彻底地驳倒了反对“日心说”的人所持的论据，从而也使哥白尼学说不仅从数理上得到了论证，而且为天文学观测的反复实践所证实。

哥白尼的学说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指导于实践。

1781 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舍尔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定名为天王星，此后，就在天文学家编制木星、土星和天王星三大行星的星历表时，发现一桩怪事：木星和土星的运动的观测资料与理论计算完全吻合，但天王星的两方面总对不上号，发现天王星有摄动现象，大多数天文学家都认为可能是在天王星轨道之外还有一颗未发现的行星在吸引它，而造成了摄动。但是，怎样去找到它呢？因为未知的行星比天王星要远离地球，倘用望远镜逐个搜索天空，无疑于大海捞针。

于是，只有运用计算去寻找它的位置，英国的亚当斯和法国的勒维耶几乎同时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是依据了牛顿在哥白尼学说基础上建立起的天体力学原理而进行的科学的计算。这一发现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这颗新行星被定名为海王星，它是太阳系的第八颗行星。它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上的重大发展，成为哥白尼“日心说”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

本世纪初，美国天文学家洛威尔根据类似的计算，指出海王星之外仍有一颗行星。1930 年，汤鲍发现了这颗新行星，并命名为冥王星，它是太阳系的第九颗行星。至此，哥白尼的学说被完全证实了，“日心说”成为论证太阳系结构的科学真理。

哥白尼“日心说”诞生后，自然科学在继续向前发展：19 世纪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使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 世纪后，现代自然科学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哥白尼在科学上的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追求真理、毕生献身于科学为人类进步作奉献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力地推动了天文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对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施以积极影响。

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世间兴亡更替如斗转星移。延续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在后起之秀奥斯曼土耳其的强大攻势下，城毁国亡。

公元 395 年，曾经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帷幕拉开了。由于君士坦丁堡曾叫拜占庭，所以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的强盛期，其领土遍及欧洲的巴尔干半岛、西亚的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及非洲的埃及和利比亚，成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

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即便在今天，拜占庭文明仍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株奇葩，在西起西西里，东到高加索，北起俄罗斯，南至红海之滨，众多民族受惠于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位于亚欧交界处的重要商道上，长途跋涉的商队和扬帆远航的船队云集而来，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马克思形象地将君士坦丁堡比作“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

然而强大繁荣的拜占庭帝国，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衰落。先是在公元 8 世纪，阿拉伯人从帝国手中夺走北非，接着随着国内大土地所有者力量的增强，中央国家政权被削弱了，同时这些分裂疆土的领主们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又激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断反抗。1204 年 4 月，以罗马教皇和威尼斯为首的欧洲第四次十字军东侵，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纵火三天三夜，全部坊肆及收藏丰富典籍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被付之一炬。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侵占，十字军在其侵占的拜占庭国土上建起拉丁帝国。直至 1261 年，拜占庭帝国才收复君士坦丁堡，但帝国已今非昔比，领土缩至一隅，经济也失去活力。外患未除，内战又起，1321 年至 1326 年，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与孙子的战争爆发，使帝国更趋衰弱，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到 15 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地，“整个民族变成了暮气沉沉，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匐在尘埃之中，转过身来他们却不禁伸拳顿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和怯懦。……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同样的腐朽，民族精神已经衰老了……”

在千年古国拜占庭无可挽回地走向穷途末路的同时，一个年轻的民族奥斯曼土耳其正在迅速崛起。

13 世纪 30 年代，突厥部落的一支，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在巴尔干半岛西北角与拜占庭毗邻的地区定居下来。不久，便向拜占庭领土发动了蚕食进攻，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布尔萨作为首都。1331 年，又从拜占庭手中夺走尼西亚城。到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时期，领土向东南欧扩张。1367 年移都阿德里亚堡，君士坦丁堡与东南欧的关联被切断，成为一座孤城。1396 年，击破十字军以后，土耳其更是威震海外。

与拜占庭相对比来看，拜占庭早在 13 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以后便已名存实亡。14 世纪中期以后，长期处于奥斯曼苏丹附庸的地位，向苏丹纳贡称臣。14 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亚洲岸边建起安纳多卢希萨尔要塞。这样，经过对拜占庭帝国的长期分割包围，灭亡拜占庭已指日可待。完成这最后一击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土耳其苏丹穆罕

默德二世。

穆罕默德二世在历史上以“饮血者”著称。1451 年，年仅 19 岁的穆罕默德继位伊始，便杀死了自己年仅 8 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弟，以防他将来与自己竞争王位。在位 31 年间，穆罕默德几乎年年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都留下了他这个“征服者”的足迹，给被征服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晚年，由于大臣中有人欲立他的小儿子杰姆为苏丹，图谋叛乱，使他疑神疑鬼，对异己无情杀戮。甚至颁发了令世人咋舌的法令，“朕儿子中即位的那个人，有权杀死自己兄弟，以维护王位和国家的安宁。”纵览古今中外，统治者为争权夺位，而同室操戈的可以说屡见不鲜，像中国古代曹魏时期的曹植被其兄曹丕威逼无奈写下的著名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便是一例。然而，明确地以法令形式允许同胞相向，血染宫廷的，却属罕见。穆罕默德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穆罕默德二世在一生的南征北战中，曾身经百战，其中，最著名的战役便是攻陷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这次战役震撼了亚欧大陆，标志着千年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新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壮大。

穆罕默德二世虽生性多疑易怒，残酷无情，但却不乏领导者的聪明才智。他精通五门外语，酷爱读书，在文学、艺术、哲学、神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涉猎。他崇拜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的功业，发誓要征服全世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

1451 年，苏丹穆拉德病逝，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登基执政。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其先辈们蓄谋已久的、也是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他的先辈们已为他占据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包括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亚洲的安纳托利亚东部、中部也臣属于这个新兴帝国。

穆罕默德二世虽对君士坦丁堡垂涎多时，但他并没有盲目地立即率兵前去进攻。他深知拜占庭帝国虽已衰落，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君士坦丁堡毕竟是昔日叱咤风云的强大罗马帝国的故都，而且，君士坦丁堡还有两大优势：首先，它是信奉东正教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其次，君士坦丁堡的地势易守难攻，东、南、北三面濒临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西面陆地又有多年修筑的坚固城墙。所以，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胜利也并非垂手可得。

穆罕默德二世的战争准备，分外交和军事两方面。

在外交方面，穆罕默德二世宣布承认父王穆拉德与拜占庭君士坦丁签订的所有条约有效，制造和平、友好的假象，以免拜占庭提前察觉自己的侵略野心。为了避免在战争中腹背受敌，与威尼斯签订和约，答应维护威尼斯商人的权益，又与匈牙利签订为期三年的休战条约，和华拉齐亚、波斯尼亚也建立起友好关系。

在军事方面，穆罕默德二世虽在战场上也吃过败仗，但总起来看，在他亲率大军征伐欧洲的 20 多次战斗中，他所制订的作战计划比较周密，行动神速，败而不馁。在征战君士坦丁堡这次战役中，他的战前准备尤其充分。

1451 年冬，他下令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岸边开始修建坚固的博加兹凯森（意即切断博斯普鲁斯海峡）碉堡，后改名罗迈利希萨尔，与一个世纪前修建的安纳多卢希萨尔隔岸相望。这就切断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沿岸各港口的联系，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粮草来源。

在军事装备上，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扩充军队。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斗打响前，土耳其陆军总兵力已达 15 万至 20 万人，分为新军、地方军和杂牌军，其中新军是 15 世纪最精锐的部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穆罕默德二世还下令大批兴建兵船，其海军舰队有战船 150 艘至 350 艘，另外，还配备了一支炮兵部队，与陆军一起构成其军事征服的支柱。这支炮兵部队有 12 个大炮连、14 个小炮连，最大的一门火炮能发射重达 1500 磅的石弹。

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野心，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并非没有察觉。早在奥斯曼土耳其加紧兴建罗迈利希萨尔工事的时候，他就派出使节，要求奥斯曼土耳其方面停止兴建，但被穆罕默德二世一口回绝。他蛮横地说：“你们有什么权利或实力来阻止我在自己土地上做想要做的事情呢？海峡两边都是我的，对于小亚细亚你们又无力保护。回去告诉你的主人，现任苏丹根本不同于他的前辈，他的实力已超过了他们的誓言”。

遗憾的是，拜占庭帝国虽已听到奥斯曼土耳其的霍霍磨刀声，却不能有效地作好迎敌的准备。统治阶层内部由于宗教观念的分歧，一派倾于向西欧各国，特别是向罗马教会求助；另一派坚持东正教的独立性，声称“我宁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土耳其人的头巾，也不愿看到教皇的法冕。”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削弱了拜占庭的防御力量，也限制了它在外交上求得别国援助，使在后来的战争中陷于孤立。

不过，皇帝君士坦丁还是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抓紧修建和加固城墙，在金角湾出口处埋设木桩，架起大铁链，选拔杰出的将领吉斯提尼任君士坦丁堡城防总司令等。这些措施后来在奥斯曼土耳其攻城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总起来看，尤其是服役士兵的素质远远不及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城内适龄男子 25 万人之中，只有不足 5000 人应召服役，加上外籍军人在内，拜占庭的总兵力不足万人，而且在海军方面也只有几只小船，武器装备也不如奥斯曼土耳其。

随着双方紧锣密鼓地加紧战争准备，一场必不可免的战争一触即发，拜占庭的上空火药味十足，战争的阴云已笼罩了这个古老的城市。

1453 年 4 月 5 日，“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亲率 20 万大军和 300 艘战舰，突然逼近君士坦丁堡城下，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拜占庭外围的两个据点——提拉皮亚和斯地门已被奥斯曼土耳其攻下，全部守兵被统统用钉子钉死，在普林基波岛上的守军，也被奥斯曼土耳其用硫磺薰出来，驱逐出去。

围城前，君士坦丁曾向穆罕默德二世求和，愿意交出首都以外的地方，遭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拒绝，他说“世界的帝国只能有一个，世界的宗教只能有一个，要缔造这个联合，世上没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合适的地方了。”东罗马求和不成，只能背水一战。

1453 年 4 月 15 日，土耳其舰队抵达普林基波岛，先是用重炮对准君士坦丁堡全面炮击了三四天，未能攻下，接着改变战略，集中一点攻击，但好不容易打开的缺口很快又被守城军民补好。

穆罕默德二世遂下令，“对城墙和铁链封锁线全线出击！”

于是，20 万土耳其军人如漫天的乌云铺天盖地涌向护城河边，一时间，枪炮声、号角声、兵器碰撞声、士兵的喊杀声、妇女的哭声、儿童的尖叫声响成一片，声势之大，连脚下的大地也跟着发抖。

但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军民在皇帝君士坦丁的领导下，凭借着优越天险，

英勇不屈地进行了顽强抵抗，城墙上的火器喷着火苗，一同投向敌群，许多土耳其士兵没能冲到护城河边，就被击毙，喊杀声与嚎哭声交织在一起，土耳其士兵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土耳其海军也被罗塔拉斯大公统率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击退，全线进攻失败了。

接着，穆罕默德二世又下令，让手下士兵夜以继日地挖掘地道，企图越过护城河和城墙，从地下潜入城内，但很快被城内的居民发现，地道被炸毁了，土耳其军队士兵不是被炸死、烧死，就是被闷死、淹死。穆罕默德二世挖空心思，又想出一计，他下令将战船的外面包上不易着火的牛皮，运送士兵和云梯穿过护城河，架起云梯，企图以此对付君士坦丁堡军民的猛烈炮火，但架起的云梯很快又被东罗马军队扔下来的蘸满松脂的火把烧断，土耳其士兵狼哭鬼嚎地坠入河中，土耳其再次被击退。

穆罕默德二世一筹莫展，他未曾预料到，小小的君士坦丁城堡会如此坚固。军事上接二连三地失败的同时，土耳其大军的庞大后勤补给也面临危机，在月底前如不能结束战争，将不得不自动撤离。土耳其将领内部也有人风闻西方世界的援军已经开拔，主张从君士坦丁堡撤退。但是，穆罕默德二世是个有坚定意志的人，对于他梦寐以求的世界最好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岂肯轻易放弃？

穆罕默德二世终于露出了笑脸，他以保证热那亚商人商业利益为代价，换得了从其控制的加拉太地区进入金角湾的权利，困扰土耳其军队时日已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当天夜里，土耳其军队将船只从涂有牛油羊油的木板路上，拖到金角湾的尽头，在天亮时分，君士坦丁堡城内的人们吃惊地发现土耳其船队已在金角湾搭起一座浮桥，筑起了炮台，开始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炮袭。

君士坦丁皇帝见状也大吃一惊，金角湾坚固的铁链防御工事一向被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他急忙从别处抽调援兵，然而由于城内兵力有限，这一来，又削弱了其它地区的防御。君士坦丁本来计划利用夜幕掩护，突袭金角湾的土耳其军队，但是不幸被一个叛徒告了密，派出的突袭士兵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此时，君士坦丁堡城内守军已不足 4000 人，谣言四起，民心动荡，有人劝君士坦丁皇帝，为保全个人性命，赶快逃命。但君士坦丁含着眼泪说：“我求你们不要再向我说这种话。而且也希望你们永远不离开我，而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决心与你们一起死在这里！”

5 月 28 日晚，君士坦丁与全城的教徒们一起来到圣索菲亚教堂，举行最后一次基督教祭礼。所有参加者都悲痛欲绝，整个仪式沉重而肃穆。

5 月 29 日凌晨，浓雾迷漫，万籁俱寂，土耳其大军的号声、鼓声、喊杀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双方的大决战开始了。拜占庭军民誓死保卫自己的城池，他们与冲进城内的土耳其军队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皇帝君士坦丁身先士卒，高呼“我要与我的城池共存亡！”带领残余将士冲向敌阵。

土耳其大军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内，拜占庭方面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皇帝君士坦丁也英勇阵亡，拜占庭帝国宣告结束。

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城池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辉煌的拜占庭文化遭到致命的打击。圣索菲亚教堂被改为清真寺，穆罕默德二世宣布将君士坦丁堡改为伊斯坦布尔并以此作为新都。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从此不复存在。然而，拜

占庭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永远载入史册。

挽救罗马帝国衰落的危机
——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

盖乌斯·奥列列乌斯·瓦列里乌斯·戴克里先（约公元 245～313）与弗拉维乌斯·瓦列里乌斯·奥列利乌斯·君士坦丁（约公元 274～337）是罗马帝国后期在挽救帝国危机方面成就较突出的两个人。要谈到君士坦丁，人们习惯上会记起与之相关联的戴克里先。

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已蹒跚地走向末路，出现了著名的“三世纪危机”。奴隶制日趋腐朽没落，奴隶主的强制劳动引起奴隶的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逃亡甚至发动起义。自斯巴达克以后，在罗马出现了隶农制。到公元 3 世纪时期，由于经济危机、政治混乱，人民无以为生，因而各地的奴隶、隶农与其他各阶层不断掀起暴动。北非、西西里等地的奴隶起义与 3 世纪中叶的巴高达运动，都给了奴隶主贵族以沉重的打击。

戴克里先就是在这种危机形势下上台执政的。

戴克里先执政以后，正式废除了延续已久的“元老院”，采用个人专权的“君主权”。君主头戴金冠，身穿华服，以地上的神自居。臣下拜见君主，要匍匐在地，行跪拜礼，吻他的脚。

为了挽救奴隶制危机，戴克里先实行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到君士坦丁时期最后完成，使濒临崩溃的罗马奴隶制帝国得到了暂时稳定。

“三世纪危机”的日益严重，使戴克里先被迫循前代瓦列里亚努斯和卡路斯的先例，实行分权政治。他与当时名将马克西米亚努斯共任“奥古斯都”，分别管辖帝国的东西两部分。后来二人又分别将辖区一分为二，自己管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再任命“恺撒”来治理。被戴克里先分封的“恺撒”是伽列里乌斯，康士坦提乌斯为马克西米亚努斯任命的“恺撒”。两位“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兄弟关系，而两位“恺撒”则被分别当作他们的儿子。这样“四君共治”的多米那制形成了，他们之间通过联姻等形式加强了联系。但是，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归于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还缩小了行省的规模，将原有的 47 个行省重新划分为 100 个行省。在行省之上，又设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包括 10 个左右的行省，全国共设 12 个行政区。对行政区的管辖，实行军权与行政权分立。这就削弱了地方行省的权力，利于防止行省长官僭位。

奴隶制危机的出现，使戴克里先不得不加强军事实力，为此，他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将帝国军团的数目扩大至 72 个，人数由原来的不足 45 万，增至 60 万人左右，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来补充志愿兵的不足。他的鼓励措施，吸引了一大批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及隶农与蛮族人。在军队编制上，将军队分为边防军团和驻扎于各省的内地机动军团。

国家实力的增强，有赖于财政的雄厚基础，尤其是行政改革后，行政机构的扩大更对财政改革提出要求。戴克里先决定改革过去的财政体系。戴克里先规定在新的税收体系下，国家实行统一税收，在农村征收统一的人头税与土地税，这两种税收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由农村地区的大庄园主负责征收和上缴。在城市地区，由市议会负责，按市民从事的不同行业收取固定的职业税，市政议员必须用自己的财产作抵押来保证国家的税收。只有官吏、老兵、无产者和奴隶免税。对于这种新税制，4 世纪时的一位作家认为“税

收空前的提高了，收税人的数目超过了纳税人的数目，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破产的隶农抛弃了土地，而耕地上则长满了树林”。

此外，为了保证国家币值的稳定，戴克里先还改革了币制，实行新的限价措施。

戴克里先于公元 305 年退位，他将“奥古斯都”一位传给了君士坦丁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公元 306 年夏，康士坦提乌斯死于约克，君士坦丁的部下拥立他为“奥古斯都”。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君士坦丁发动了三年征战，终于胜利进入罗马，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奥古斯都”。

后世对君士坦丁的评价，也许没有比美国人迈克尔·H·哈特的概括更高的了，他充满激情地作了如下的评断：

‘我们很难断定没有君士坦丁，历史将会如何书写，但是很显然，正是在他的作用力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其后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便从一个少数人的宗教一跃而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占统治地位的法定宗教。显而易见，君士坦丁是欧洲历史上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

因此，君士坦丁虽然名气不及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大，“但是他的影响力更为持久”，所以在世界名人中的排次应在这三人之前。

君士坦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获此殊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希望那个时代的历史能告诉我们。

君士坦丁时期（306～331 年），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

他废除“四帝共治制”，进一步神化帝权，在行政划分上，继续贯彻执行使地方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解散了不听从指挥的近卫军，组建新的官廷卫队，独揽了全国的军事大权。蛮族士兵被大批充实进军队中，以补充兵源的不足，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中被委以重任，君士坦丁正是利用这支蛮族军队，战胜他的政敌。

根据君士坦丁的法令，实际上已恢复了奴隶主杀害奴隶的权力，早在 2 世纪时，皇帝哈德良和安敦尼已颁布了禁止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而君士坦丁的法令却规定：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恶劣行为则鞭挞奴隶致死，不受追究。3 世纪时，对煽动奴隶逃跑的人，仅处以罚款，君士坦丁却规定要受严刑拷打。以前对捕获的企图逃奔蛮族的奴隶，只是将他们交还原主，君士坦丁规定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的奴隶甚至被砍断了腿。君士坦丁还违背了罗马传统的基本准则正式宣布，准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他还颁布法令，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无礼的”被释奴隶及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还颁布法令，将隶农固定在土地上。公元 332 年，君士坦丁颁布的敕令规定：“任何人，如果在他的地产内找到了别人的隶农，不但应把隶农送回原地，而且应负担隶农在那个期间（即归他所有的期间）的人头税。至于隶农自己，凡是意图逃亡的就应该被束缚于不自由的地位，由此，在这种奴役地位的惩罚之下，他们就会被迫去完成与自由人相同的义务”，这项法令实际上把隶农重新降到奴隶的地位。敕令宣布：“对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拷，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的法律，也涉及他的子女：儿子不能离开继承自己父亲名下的那块土地，女儿不能同别人领地上的

隶农结婚。隶农与自由民通婚是非法的。隶农无权控告自己的主人，未经主人同意不能参军，也不能出卖自己所有的任何一件物品。法律根本不承认隶农有财产权。

对于其他手工业者，君士坦丁也采取措施，将他们牢牢地限制在他们所属的固定的同业公会里，“……工匠要一辈子处于其现有的地位”，而且为了防止一些行业的手工业者逃跑，还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

君士坦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固定的劳力和稳定的税收。它使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普遍恶化了，并由此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后世公认，君士坦丁最大的贡献和成就是在宗教领域的政策和改革。他改变了戴克里先时期反对基督教的政策，对基督教的复兴和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戴克里先时期，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他像“奥古斯都”及其他前任皇帝一样，坚持和复兴古老的罗马宗教，借助“君权神授”的教旨，皇帝被认为是上天委派到人间来治理百姓和国家的，这是上天的意志，任何个人不能反对和反抗。这种宗教宣扬说，罗马伯神朱庇特是皇帝的主要保护者。戴克里先执政期间进一步宣扬说，戴克里先皇帝是朱庇特的儿子，罗马旧教对皇权的宗教认可，以及它在人民中广为传播产生的思想影响，利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所以受到了包括戴克里先在内的统治者们的欢迎。

但是，基督教此时已在全帝国范围内蔚然成风。在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它不仅在东方各省、而且也在西方各省和罗马城拥有人数众多的信徒。据英国历史家爱德华·吉本估计，当时在 100 万罗马城人口中，基督教徒约有 5 万人，即占二十分之一。就连戴里克先自己的妻子普里斯卡和女儿瓦列里娅也仰慕基督教。为了容纳日益增多的信徒举行公共礼拜。在城市里新的更宽敞更堂皇的教会建筑物，被一批批地兴建起来，在基督教团体已在全帝国范围内形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条件下，戴克里先再想用恢复旧教崇拜的方式来对抗基督教的传播，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在 3 世纪的最后 15 年，基督教受到了戴里克先宽容的对待。但基督教否认“君权神授”，又有不隶属于国家的独立的教会组织。尤其使戴克里先忧虑的是基督教对军队的影响。基督教方面的史料引述了当时的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士兵拒绝接受皇帝的宗教奖赏，或拒不遵守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某些军事纪律。这是戴克里先所不能容忍的。他颁布法令提高旧教祭司的威望，鼓励他们去反对基督教。他在东方的共治者伽列里乌斯采取了同样态度。303 年，戴克里先颁布了反基督教的敕令，禁止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在全国对基督教徒严厉迫害，两年时间里，在各地逮捕、审讯和处决了一批最顽强的基督教徒。许多基督教堂被破坏，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基督教徒被开除出军队和官吏的队伍。

到 312 年，君士坦丁最终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一举击败国内的最后竞争者，成为罗马帝国名正言顺的继承者。从此，他采取了与戴克里先截然相反的宗教政策，积极鼓励和发展基督教的传播，使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渐渐成长为一个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关于君士坦丁为什么会实现这样一个巨大转变，后世有一个流传四方的故事是这样解释的：

公元 306 年，年轻的君士坦丁继承父位，被宣布为“奥古斯都”，但他

还没能在整个西罗马确立起绝对统治地位，前西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仙仍在罗马城内飞扬跋扈，不服从君士坦丁的统治。君士坦丁决定以武力征服实现统一。

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已处于最终征服帝国的前夕，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对手马克仙负隅顽抗，君士坦丁的军队伤亡很重。双方对峙于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的两侧，一时难分胜负。

君士坦丁为此愁眉不展，一天晚上，他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苦苦地思索着对策，连日来的征战厮杀使疲惫不堪的君士坦丁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恍惚间，他发现自己高高地坐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俯瞰着脚下辽阔的罗马大地。这时，一道金光从天空闪过，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高高地悬在天宇中，发出神圣的光晕，旁边还有一行字：“ 靠此获胜 ”。接着，一个慈祥的面孔取代了十字架，君士坦丁认得这是基督耶稣。耶稣用洪亮地声调嘱咐他以十字架为旗微。醒来之后，梦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君士坦丁相信这是基督的启示，于是立刻命令士兵在军旗上绣上十字架标志，又在士兵们的盾牌上刻下“ XP ”两个字母，这是希腊之“ 基督 ”的字首，他又把基督显灵的事告诉士兵们，顿时军威大振，士兵们相信有耶稣基督在保佑他们，必然会大获全胜。

于是君士坦丁的军队在十字军旗的指引下，在“ XP ”盾牌的保佑下高呼“ 为基督而战 ”、“ 基督与我们同在！ ”的口号勇猛地冲向马克仙的军队，顿时杀声震天，敌人被杀得人仰马翻。这一战，君士坦丁大获全胜，米尔维安桥一役彻底结束了君士坦丁继位以来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君士坦丁由此明白基督教的重要性，从而后来实行了对基督教宽容的政策。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法查究，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首先，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的影响比戴克里先时期更为深远，不仅平民中很多人都已皈依基督教，而且军队中的官兵有许多人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当皇帝的命令与基督的命令相矛盾时，他们宁愿顺从基督，所以他相信有了基督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定会给他的统治带来无往不胜的巨大影响。君士坦丁本人虽然很晚入教，但是，他的母亲赫琳娜早已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对他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基督教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也发生了有利于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变化，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初期基督教的反抗战斗精神已经消失殆尽。这些教义谆谆告诫信徒：“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服从一切人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主，或是君王所派的罚恶赏善的臣宰。" 在上有权的人，人人当顺服他。…… 凡掌权者都是上帝任命的。 ”“ 我们为皇上，为帝国祈祷…祈求世界末日延期到来，我们盼望帝国国运天长日久！ ”

由此，君士坦丁清醒地意识到，以基督教为纽带连接整个帝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决定响应历史的召唤，做他应该做的事。

公元 313 年，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份。君士坦丁正式颁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米兰敕令》。敕令中规定，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将先前没收的教产归还教会，保护教徒，给教职人员免收城市徭役的特权，同时规定以星期天作为礼拜日。这个法令的宣布，结束基督教在罗马大地上受迫害打击的历史，极大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教堂拔地而起，其中就有世界上最著名的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

教堂。基督教从此名正言顺地在罗马大地上扶摇直上，也正式从苦难人民的寻求精神安慰的宗教变成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君士坦丁作为信仰基督教的第一位罗马皇帝，不久又宣布重修与扩建拜占庭老城。公元 330 年正式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迁都君士坦丁堡。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并作为基督教的一大中心在历史上留下了盛名。

不久，君士坦丁又注意到一个新情况，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组织来统筹教会事务，各自为政的主教们使基督教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这不利于帝国的统一。

当时影响较大的异端教派阿里乌斯派以亚历山大教会为中心，与罗马教会相抗衡。他公然否认圣父与圣子一体的基督教正统理论，他认为基督是神创造的，必然位于神（上帝）之下，不可与上帝视为一体。这一理论在东部各省广为流行，却遭到了罗马基督教会的激烈抨击。

为了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亲自在尼西亚主持会议，来自帝国东部与北非各地的主教，共 300 多名纷纷从各地赶来，罗马教会也派来了主教团，阿里乌斯与罗马方面经过很长时间的激烈辩论，终于阿里乌斯的学说被否决，阿里乌斯派被作为“异端”驱逐出教，他本人也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

尼西亚会议上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信条——《信经》，决定“耶稣基督（圣子）与上帝（圣父）同性（同体）”应为全体教会共同遵守。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 20 条，以加强主教权力，这实际上加强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因为教主是由皇帝任免的。

尼西亚会议使基督教在政治和思想上成为罗马国家的统治工具。这次大会也被称为“全世界大会”，教会的权威被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尼西亚信经》为统一基督教义作出了贡献，成为基督教正统的学说，也标志着基督教从原始基督教到统治阶级工具这一角色替换的完成。

君士坦丁与戴克里先两位皇帝，为拯救帝国危机费尽了脑筋，然而，帝国的灭亡毕竟已成为定势。337 年，君士坦丁死后，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到公元 394 年，由提奥多西一世最终统一了帝国。但好景不长，395 年，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以拜占庭为首，称东罗马帝国，西部仍定居罗马，称西罗马帝国。

英法百年战争

中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与法兰西王国，为了争夺两个富庶的地方而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 1337～1453 年间，大不列颠的国王们——从爱德华三世到亨利五世——三番五次地率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法兰西的领地上去寻找他们的大陆通道。然而法兰西人遵循自己民族的情感，保卫自己的民族，与他们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较量。最终，雄心勃勃的英国人只能在梦中去寻求他们对迷人的吉尔内和绿草如茵的诺曼底的回忆了。百年沧桑，悲歌一曲，其中的曲境离情，世人唯有倾听英吉利海峡中那些湛蓝色的波涛诉说了。

佛兰德尔和阿基坦两地在十四世纪初的欧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佛兰德尔以发达的纺织业而出名，这里有意大利人的金钱和英国农村的羊毛。此地的统治者是法兰西国王分封的一个伯爵。但是佛兰德尔各城邦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利，它们和伦敦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英国的羊毛主要出售给佛兰德尔各地，同时佛兰德尔的呢布又输往英国。佛兰德尔伯爵是倾向于法王的，而佛兰德尔的市民阶级对此感到不满，难以忍受。阿基坦位于法国西南部，它是基恩和加斯科尼连同附近某些小的省份的合称。在政治上，英王爱德华三世作为法兰西国王的附庸而持有此地。但阿基坦本应属法国所有，况且此地盛产葡萄酒和食盐，法王不把它收归自己的版图，也是决不甘心的，基于以上原因，两国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摩擦和口角，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到了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双方终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只有兵戎相见了。由于战事时起时落，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所以史学家们习惯地称这场战争为“百年战争”。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是 1327 年登上王位的，那时他才 15 岁。由于年轻的国王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加上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爱德华三世为了持有他在法国的领地而被迫向法国国王行臣服礼。

1328 年法国加佩王朝告终。新的华洛瓦王朝登上法国历史舞台。国内贵族即拥立瓦卢瓦伯爵之子腓力为国王，称腓力六世（1328—1350 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英法爆发了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英法两国争夺领土的斗争由来已久，最近的原因是法国国王想收复英国在法国的最后一块领地亚奎丹，而英王爱德华三世则借口自己是腓力四世的外孙，要求继承法国王位。腓力即位后，认为法国政治统一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拥有以波尔多为海口的基恩，所以他一直在寻机将英国人赶出这一地方；另一方面，爱德华三世也一直想将富庶的佛兰德尔揽为已有。

英法两国战争的导火线是法王想吞并富庶的佛兰德尔。1336 年佛兰德尔伯爵路易（他是法国王室的亲属）下令逮捕英国商人，禁止佛兰德尔与英国通商。英王爱德华三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禁止羊毛输入佛兰德尔并逮捕一部分佛兰德尔商人作为报复，造成工场停产，工人失业，秩序一片混乱。

两位君王之间，没有一天不发生争吵，因捕鱼而引起的水手之间的争执、商人事件等，为了居先权而发生的纠纷越来越严重，争吵到后来发展到了一些小的武装冲突。腓力多年以来曾在阿基坦屡次发动小规模的袭击，以试探对方的虚实。在外交上，他甚至支持苏格兰人反对英国的行动。英国自爱德华一世就奠定了征服威尔士的基础，但是苏格兰人的反抗是令人最伤脑筋的，爱德华一世本人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远征苏格兰途中病逝的。由于苏格兰

人的英勇作战，英军原先占有的城堡接连失陷。后来爱德华二世又于 1314 年遭到惨败，英国失去了它在苏格兰的最后一个据点。爱德华三世虽重开战端，仍对苏格兰人的游击战束手无策。在以后的战争中，苏格兰人总是与法国交好，英国则力图拆散两国的结盟。

1337 年，爱德华三世决定给法国人一点颜色看看。11 月他给法王腓力六世送去挑战书，并要求取得法国王位；同时他还通过议会批准额外捐税，以备战用。腓力六世当然不甘示弱，他当即下令法军出兵基恩，百年战争从此开始。

从双方的实力来看，英国似乎处于不利地位。当时英国只有三百万臣民，兵源贫乏。罗伯特·布鲁斯统治的苏格兰是倾向于法国的，爱尔兰是独立的，英王在威尔士的统治还没有最后巩固。在经济上，英国的航海和农业相当发达，但是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和商业，相反，法国的人口相当于英国的五倍，她可以征集 1.5 万名战士。

可是法兰西的一切敌人都是爱德华的朋友，首先是佛兰德尔人。他们于 1328 年在卡塞尔刚被腓力六世打败，然而佛兰德尔人并未屈服，他们不断地反对法王的苛政和横征暴敛。腓力六世还将罗贝尔·德·阿图瓦逐离他的领地，罗贝尔便跑到伦敦去避难。英国乘机威胁佛兰德尔，从今往后要停止羊毛的供应，于是佛兰德尔的市民就推举一位名叫雅克·阿尔特韦德的呢绒商人为该地的首领，并且承认英国王的宗主地位。

除了阿基坦和佛兰德尔之外，布列塔尼亚也成了两国争夺的目标。1341 年，布列塔尼公爵死后无嗣，法王鼓励查理·德·夏蒂荣——布卢瓦嗣位，英国则支持约翰·德·蒙福尔继承公爵宝座。经过一番较量，夏蒂荣取得了成功。爱德华恼羞成怒，遂派兵远征布列塔尼，于 1342 年在那里开辟了第三战场。

早在 1337 年 5 月 24 日，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便采取措施，宣布没收英王在法国的领地，并派兵进入亚奎丹，夺取要塞数处。

1338 年夏，英王统率他的军队至尼德兰会合其盟友，于次年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战争伊始，英王便在法国北部占到上风，他禁不住得意洋洋。他手下的将士乘机在所到之处大肆劫掠，当地的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正当此时，法国海军也不断拦截英国船只，英王只得暂时返回国内组织力量予以反击。两年后，英军在埃克吕斯大败法国及卡斯蒂利亚的联合舰队。在这次战斗中，法国 172 艘战船，被击沉 142 艘。从此英王便牢牢地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握于自己手中，爱德华三世也由此役的告捷而自封为“海上霸主”。由于佛兰德尔人无条件的协助，英国军队有了一个在法国的立足点，从那里出发便可驰骋于法兰西全境。

爱德华三世在 1340 年的埃克吕斯港之战中战胜了人数比自己多出三倍的法国舰只，其中自由农民的长弓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英国长弓手那一次不过是小试锋芒，他们在后来的克雷西战场上才真正地显示出非凡的实力，英国新型步兵的弓箭手战胜身穿甲胄缺乏效率的法国骑兵和雇佣兵。爱德华三世击溃法国海军之后，便致函腓力，正式提出王位要求，但遭法王拒绝。于是他又于 1346 年 7 月率军再次在法北登陆。此次英王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装备甚精，它的主力是一批训练有素的自由农民。

英军自北向东行军，途经鲁昂和巴黎，然后折向北上。腓力率重兵尾随其后，欲与英军决战。英军行至松姆河边时形势危急，前阻于河，后有追兵；

然而经一俘虏指点得以安然渡河。等腓力率军前来的时候，英军已是磨刀而待了。8 月 26 日腓力六世下令雇佣的热那亚弩手约 1.5 万人在第一线射击。英军占据了山岗，处于有利的地形，法军被迫仰攻，加之法军连续行军疲惫不堪，在士气上早已输了一着。其时雷雨交加，热那亚弩手的弓弦被雨水淋湿，而英国弩手的弓弦却未受影响。英军居高临下，一时间箭如雨注，法军立刻被打得落花流水，法国骑士虽然勇猛善战却仍无济于事。这次战役，英军仍以少胜多。法国步骑兵损失万余人，其中大小封建主的 1500 人，而英军仅有约 50 人阵亡。最后腓力六世只得率领少数随从连夜逃至亚眠才得以喘息。此役即著名的克雷西战役。

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获胜后，立即马不停蹄挥师北上加莱，准备一举拿下这个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港口城市。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英军在围困了加莱长达 11 个月之久才于次年 8 月攻陷了它。据有人描写当时的情景是：加莱的 6 名显贵人物，光头赤足，颈系绳索，带着加莱城门的钥匙跪在爱德华三世面前乞降。英军进城后，即对城里的居民肆意侮辱以发泄心中的怒恨。此后足足有两个世纪的时间，加莱一直在英国人的控制下。从 1391 年至 1558 年，加莱成为英国在大陆的羊毛中心站，英王从此地可收取丰厚的关税，故加莱的占领对英国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克雷西之战使法军几乎全军覆没，然而比英国步兵杀伤力更大的黑死病在战后又袭击了法国。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国王腓力六世也死于这次黑死病。死神在各地流行，它并不承认国旗与疆界，它渡过英吉利海峡光顾了大不列颠，死亡在那里蔓延着，黑死病造成的损失令英法两国在短期内难于互相厮杀。教皇此时出来调停，于是便有了英法间七年的休战和约。

克雷西之战对法国封建骑士的军事制度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用成千将士的血换取的教训未能改变统治者的成见。腓力六世的继承者、外号好心人的约翰仍然认为：重装骑士完全可将敌人击败。从 1335 年开始，刚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的法国，又在紧张地备战了。同一年，英国黑太子爱德华（因身着黑色甲胄故名）率军自基恩出发，在法国中部地区纵横稗阖，未遇对手。英军经布尔热附近便转向西北远行至图尔。约翰二世率军从后面尾随而至，准备先断英军归路，然后将其一举歼灭，英军得知法军的意图后便立即向南撤退。然而约翰二世已在普瓦提埃静候黑太子的到来，当时法军驻守于米瓦松河岸陡峭的小高地上一个农庄附近。英军在人数上少于法军，且后勤供应缺乏，所以处境险恶。在此情况下，黑太子爱德华提议：如让他南归波尔多，宁愿再休战七年。但约翰二世不愿放弃获胜的机会，他断然拒绝了爱德华的要求，并于 9 月 19 日发动了攻击。由于黑太子所选择的地形为葡萄园和树篱所遮盖，骑兵不便于展开冲锋。双方骑兵只能在地上展开厮杀，这次法国骑士身穿笨重的甲胄行动非常迟钝，结果在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英国弓箭手面前，显得非常狼狈。法军伤亡惨重，约翰二世被英军围困，最后只得投降，他本人及其幼子腓力成了英国人的俘虏。

1356 年法国在普瓦堤埃战役失败后，18 岁的王太子查理受命摄政，他为了筹集战费和国王赎金，乃召开三级会议，在 800 名代表中，半数是市民代表，他们要求惩治失职官吏，并拘捕以财政大臣罗伯特为首的 22 名高级官吏，强迫他们交出侵吞的公款。王太子查理十分害怕，下令解散会议，市民更加不满，整个巴黎开始骚动。查理被迫于 1357 年 2 月再度召开三级会议。在巴黎呢绒商会会长艾田·马赛的操纵下通过一系列改革决议，称为“三月

大敕令”，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级会议设立 36 人的执委会（每个等级 12 人），负责监督政府，国王必须服从三级会议的决定，每年召开三次例会，审定国家大事。如果国王执行大会决议，市民则同意筹款装备三万军队，抗击英军。此外，还有对租税收支进行监督及救济贫民等。

王太子查理一再拖延执行改革决议，终于爆发市民起义。1358 年 2 月以艾田·马赛为首的 3000 名起义者，冲进王宫，当着王子的面杀死三名贵族，一个叫罗伯特·克来芒，是正统的军事贵族；一个是康福兰勋爵；另一个是法国西蒙·布西勋爵。王太子查理由于艾田·马赛的包庇掩护，使他在混乱中逃出巴黎，在郊区集结军队，修筑工事围困起义的市民。

这时法国北部农民因战乱和重税也爆发起义。1358 年 5 月 28 日，生活在巴黎北部博韦主教区的农民，打死几名行凶的王太子军士，起义由此开始。后来起义失败了。

农民起义的失败，给巴黎市民政权敲起了丧钟。王太子查理的军队将巴黎团团围住，1358 年 7 月 31 日巴黎街头发生巷战，艾田·马赛在战斗中被打死，8 月 2 日王太子查理的军队占领巴黎，接着对起义市民进行大屠杀，查理终于获得了胜利。

太子摄政后，英法两国战事时起时落。双方遂于 1360 年 5 月 8 日在布勒丁尼缔结和约。和约的签订是双方都指望结束战争的结果。英国在和约中取得了诸多好处，她通过和约扩大了在法国西南部的领地，如基恩和加斯拜尼等地总称阿基坦公国，并且以后英王不必再为这块领土向法王举行臣服礼；北部主要港口加莱及包括克雷西在内的一大片领地也归属英国；法国还必须交出赎回国王约翰二世等的赎金，并且不得再支持苏格兰反对英国。这样，法国卢瓦河以南的大部分领地落入英国人手中，战争再起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后来由于法国国内政局不稳，太子力量很弱，所以不得不再次同英国谈判。到 1380 年，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加莱条约肯定了布勒丁尼的预备条款，爱德华三世许诺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条件是取得普瓦图、圣东日、昂右姆瓦、利姆赞、佩里戈尔、阿热内、凯尔西和鲁埃格等地作为补偿。英王在法国的财产免于纳贡。条约的签订带来了惨重的后果，约翰二世回到巴黎后，没有能力缴付赎金，为使其他人质获释，他又返回伦敦。1364 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病死在狱中。

查理六世要使法国振兴起来，唯有实行暂时的休养生息之策。和平恢复后，商人和农民又振作精神，生产逐渐回升，商业往来也得以复苏了，法国再度繁荣起来。在国外，查理六世和德国结为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四世亲自到巴黎进行正式访问，法国还保持着与加斯苇利亚的盟国关系，以此作为防御大不列颠再度进攻的一种武器。

巴黎的珠宝重新唤起了英国贵族们的贪欲。法国国王在西特岛上建起了辉煌的宫殿，而悲剧的时刻又要在宫中那只新挂钟的钟盘上敲响了。在英国，主战的兰开斯特派占到了上风。1399 年，亨利即位，称为亨利四世，他的继承人亨利五世于 1413 年登基。亨利五世作为金雀王朝的杰出继承者，为英国找到了重返大陆的通道。

英王爱德华三世逝去后第四年，即 1381 年，英国也发生了一次如法国那样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次起义的根源由来以久，但直接的原因可说是 1377 年议会通过的人头税法案。这次法案对 14 岁以上的所有男人和女人每人征收 4 便士。由于这笔人头税不能满足对法国进行战争的需要，1379 年又

征收了一次补助税，然而仍不能支付全部军费。在此情况下，1380 年 11 月议会在北安普顿又通过了第三次人头税，规定所有年满 15 岁的人，每年交 1 个先令。这无疑给已受黑死病、暴乱和饥馑严重摧残的农村雪上加霜。当议员们在仲冬从北安普顿驰马还乡的时候，他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议会的法案已将农民推到了揭竿而起的境地了。起义于次年 5 月在埃塞克斯郡福宾村镇爆发。瓦特·泰勒成为这次起义的领导者。起义者勇猛地摧毁贵族们的庄园和宫殿、释放监狱中的犯人、焚烧法学会的档案，伦敦各地瞬间成了起义者的天下。起义深深地震惊了贵族统治者。伦敦市长主张运用军队镇压，而城府颇深的索尔兹伯爵则出面阻止。他对国王说：“ 陛下，如果你用好言安抚，给予他们所向望的东西，那是上策；如果展开一场我们不能最后成功的举动，我们就再也不能够恢复，我们和我们的继承者都要完蛋，而英格兰将成为沙漠。 ”依据他的建议，国王约定起义者代表去迈尔恩德举行谈判。

6 月 14 日，农民代表提出要求，史称迈尔恩德纲领，其内容包括：1.废除农奴制。2.废除劳役制。3.持有他人士地者每英亩只交 4 便士地租。4.除掉出于自己的善良愿望，并且依照正规的契约规定外，任何人将不再服役于任何人。5.在王国的所有城市、自治镇、村镇、市场和其他地方实行自由买卖。面对农民起义咄咄逼人的气势，国王被迫同意了迈尔恩德纲领的一切要求，并发给农民自由特许证书。正是这一诡计使得部分农民离开首都各自回家了。但他们的领导人瓦特·泰勒与约翰·博尔仍留在伦敦，特别是大量缺少土地的农民，再次要求会见国王。

农民占领伦敦的第三天，国王在城外再次会见他们。瓦特·泰勒代表农民提出了要求，史称史密斯菲尔德纲领，它的内容更进一步地要求废除农奴制和维兰制，一切人都应自由。其他的条件显然反映了少地农民和雇工的要求。就在瓦特·泰勒与国王谈判的时候，伦敦市长奸险地刺杀了泰勒。农民再次受骗，被迫回家。国王则违背他的诺言，展开了对起义群众的杀戳。起义遂宣告失败。如果人们不是孤立地来看 1381 年的起义，而是从 14 世纪城乡阶级斗争的发展来看问题，那就不会轻率地断言此次起义对今后农奴制的瓦解没有起什么作用。希尔顿评价说：“ 事实上有良好的理由来设想，黑死病后的封建反动，不仅部分地要对加速起义负责，而且它作为起义的结果而逐渐消失。 ”

1380 年查理五世去世，由其患癫痫病的 12 岁的儿子查理六世继位（1380—1422 年）。国内两大封建集团：奥尔良党和勃艮第党趁国王年幼多病，相互争权，政府瘫痪，人民不满。1381 年朗该多克爆发“ 提香 ”起义，1332 年巴黎爆发“ 铅锤党 ”起义，他们用铅锤为武器，攻打监狱，捕杀贪官污吏。

1403 年 11 月 23 日，奥尔良公爵在巴黎被勃艮第的年轻公爵无畏的约翰所杀。没有一个巴黎人表示抗议，因为他们都赞成勃艮第，而仇恨奥尔良。勃艮第的族徽是一个刨子，奥尔良则是一根棍子。奥尔良公爵被杀后，刨子便凌驾于棍子之上。但到后来，当圣安德烈的十字架和勃艮第的绿帽子控制了巴黎的大小街道时，就有人支持奥尔良了。首先是奥尔良公爵的岳父马雅克伯爵领头表示反对。他联合了贝里公爵和波旁公爵这两位有力的王公。南方的领主们把白披肩和阿尔马雅克家族的荨麻族徽联合在一起。联军在蓬图瓦兹扎营，直逼巴黎城下。

都城内对约翰的怨言也是与日俱增，人们指责无畏的约翰夸下了海口，实际上不能兑现。为了满足老百姓而颁布的卡博什法令只答应实行改良，人

民的要求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在人们的内外夹攻下，约翰不久只得离开巴黎，让位于奥尔良派。1414年宣告休战。两派都想寻求盟友以取得胜利，而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英国。这样，封建的欲望超过了民族的感情，内战再一次向英国人敞开了法兰西的大门。

法国内部的纷争助长了英王的野心。当时英国国王是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26 岁时就成为英格兰国王。他和亨利四世不同，对自己的王冠觉得称心如意。他在军营和政务会中度过了弱冠之年，并且在父亲患病期间断断续续地掌握英格兰国政达五六年之久。

在动荡不安的英格兰王国，国王久病不愈，各派互相勾心斗角，社会上和精神上的不安定因素异常激烈，亨利五世因此一度成为众目所瞩的救星。

亨利五世于1414年8月派遣了一个以达勒姆主教和诺威奇主教为首的使团前往法国，其目的据说是提议“和平与联盟”。英国代表提出两点要求：1.将查理六世之女卡特琳下嫁给英王。2.要求得到诺曼底和金雀花家族在法国的世袭领地，要求对佛兰德尔和布勒丁尼有宗主权。很明显，英王的目的无非是想继续保持布勒丁尼和约所规定的条款。而奥尔良派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亨利五世先礼后兵，随即亲自率领一支有 6000 骑兵、4 万名弓箭手的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去惩罚违拗他的意愿的法国人。

英王的军队在塞纳河的阿弗勒登陆后，即向北朝加莱进军。事前英王与勃艮第派达成默契，后者保持中立。1415 年 10 月 23 日，亨利五世与法军在阿赞古尔交锋。结果法国人再一次尝到了惨败的苦果。英国弓箭手使他们丧失了军队和骄傲。几小时后，英王已经可以看到巴黎的城门向他敞开了。但亨利五世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君王，他并没有占领巴黎，而是于 11 月班师回国了，据推测英王可能是避免法国人重新团结起来抵抗他而采取此策略的。

亨利五世回国后，于次年 8 月在坎特伯雷与德国皇帝缔结反法的同盟条约。这时法国贵族之间的争斗又起，9 月约翰被奥尔良派刺杀，其子腓力嗣位。

1417 年亨利五世重渡海峡，他的目标是夺取诺曼底。此次英王进展顺利，诺曼底的城池一个接一个被他攻陷，鲁昂居民被围困半年之后，也不得不打开城门迎接他，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可以左右法国的局势了。1420 年 5 月，亨利五世与和善者腓力在特鲁瓦签订了和约。通过和约，亨利五世娶了法国国王的公主，并且被承认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从此英国国王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卢浮宫，昔日征服者威廉的梦想终于在亨利五世的手中变为了现实。

亨利五世的征服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分裂的法国，在他死后，其子亨利六世成为法国国王，统治着法国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勃艮第还统治着勃艮第公爵国、内韦尔伯爵国、佛兰德尔以及北方的阿图瓦；另外太子查理偏安一隅，国土只限于布尔日附近地区。有人称它们是三个法国：英国人的法国、勃艮第的法国和查理的法国。

其时查理的领地虽小，而支持者甚众。奥尔良公爵、弗瓦伯爵和阿尔马雅克伯爵都愿为查理效劳；法国中部和南部地区都热烈地拥护他；此外太子还联合了朗格多克和里昂，加斯科里的绿林首领们也都来增援，这对于查理来说，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查理目睹半壁山河落入英国人手中，不禁起了光复国土的念头，然而要使梦想变成现实，必须赶走势力强大的英国人和

征服勃艮第派，这对他这位“布尔日小国王”来说，并非易事。

亨利五世去世的时候，英国已经在法国取得军事优势。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约翰去法国担任摄政王和总司令，此人是一个有军事才能的继承人。英国同勃艮第的联盟仍然存在，这使它赢得了巴黎的忠诚和支持。1422 年 10 月，曾经签署《特鲁瓦条约》的法国国王逝世了，英国的幼主登上了法国王位，但是他的继位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卢瓦尔河以南，法国皇太子实行着统治，而且即将加冕为王。英法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英国弓箭手的攻击。多次的围困战和抢劫使乡村无限萧条冷落。

然而战争的牵连却遍及了国家的每个角落，为支持战争，王室和各王公的税务处从战争开始以来就向城市平民搜刮。交通不安全以及内战和外战使城市居民的供应成了问题，农村则盗匪出没，遭受军队的洗劫，显得凋敝不堪。战争对于两国的平民和其他人来说，无疑是痛苦和死亡。

战争和不安全自然也加深了从十三世纪末就已经出现的欧洲经济危机。意大利商人利用陆路越来越少了。他们不敢去内地城市经商。工商业因而大受影响，大市集消失了，北方呢绒商人纷纷破产。

在整个十四世纪，欧洲几乎所有城市都流行黑死病。这种可怕的瘟疫非常神秘地从亚洲传来，最初在法国南部蔓延，然后迅速扩散开来，患此病而死亡的人远比战争造成的死亡多。据估计，在当时的法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染上了黑死病。

战争和瘟疫使城市和乡村失去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劳动力。粮食奇缺，货币贬值、耕田的人大批染病死亡，消费者死得更多。这些灾难不免会产生暴力和抗争。村镇不断出现暴动。村民离家出走，领主的土地被没收，加上血腥和盲目的镇压……。面对一个支离破碎，淌着鲜血，燃着烈火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所渴望的几乎是同样的：结束战争，恢复自由和秩序。

虽然英国人的初衷也许是尽可能不改变当地的社会习惯，但在法兰西广阔的疆土上建立起英国和勃艮第权威的结果，却使法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法国人要想重振雄风，就不能将对英战争再拖延下去了。

这样英法双方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英国要扩充势力，法兰西要统一国土。矛盾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在一场决战中见分晓。

1428 年，贝德福公爵决定围攻法国中部重镇奥尔良。英军采用了堡垒战术，他们在奥尔良城周围修筑了大约 60 个堡垒。该城居民在迪诺瓦伯爵约翰的领导下决心誓死一战。但由于外援断绝，饥饿难忍，加之敌军炮火日夜轰击，伤亡人员日益增多，不免有些力不从心。然而恰在此时，幸运之神仿佛向人们微笑了，上帝将一位“圣女”奉送给了法兰西，她的名字叫贞德。

贞德出身于法国东部默兹河上游左岸的多雷米村一个农民家庭。她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身材小巧，幼年就能处理家务，能纺线和缝补，又曾在小客栈服务，她经常骑着客人的无鞍马匹去河边。星期日她常常在森林里漫步，那里有许多圣骨，那里的人们还传说，有朝一日，从那些橡树林里将走出法国的救世主。她在地里放羊时，产生了幻觉，上帝的圣徒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们为法国的命运感到悲伤。圣迈克尔指示她以神圣的权利去指挥救国大军。起初，贞德在这个艰巨的使命面前退缩了，后来当圣迈克尔在本村教会的守护神圣玛格丽特和圣卡特琳的陪同下再次出现时，她服从了这一命令。这个少女满怀忧国之情，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可能比较神奇，但无疑是不可战胜的。

同穆罕默德一样，她受到家庭的最大阻挠。她说服了附近小镇的镇长，使他相信她受了神的启示。镇长介绍他去拜谒已经陷入绝望的宫廷。她经过艰难的旅行，来到了国王住的大厦里。在大厅里，国王有意同朝臣混在一起，但贞德借着火炬的亮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国王于是非常感动。贞德同皇太子单独谈论国家的机密大事，这些事情不是圣人告诉她的，就是其他高级权威人士透露的。她要求得到一把古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把剑，却能说出它的特征，国王身边的人为此感到惊讶不已。不久查理七世下令派军队运送给养支援奥尔良，贞德被允许随军前往。

当身披甲胄，容光焕发的贞德率领一支由迪努力瓦指挥的军队在奥尔良城出现之际，被围将士欢欣鼓舞，而英军则茫然不知所措。由于援军的到来，法军士气大振。贞德高举耶酥的旗帜，在战士和居民中激起了无比的抗战热情。法兰西人的民族心理迅速成长起来。奥尔良周围英军的堡垒不断减少，堡内的敌人也被处决了。相反，法军的伤亡却很少。1429 年 5 月 7 日，贞德率领法军攻占了奥尔良南部卢瓦尔河大桥南端的重要堡垒图雷尔，杀死了英军三名重要指挥官和许多贵族。此次战役的获胜，使奥尔良城与法国中部各地的联系畅通无阻。奥尔良女郎的英名令英军不寒而栗。5 月 8 日，英军被迫撤退，被围困达 7 个月之久的奥尔良终于解围了。

奥尔良解围后，贞德立即偕同太子赶往德兰斯，7 月 17 日，查理七世涂上圣油加冕。在被占领的法国，所有含冤负屈的人都注视着这位奇迹般地在“圣女”指引下的新的君王。贞德的信念感染了整个法兰西民族，从今往后，光复国土成为每个法兰西人的责任，成为整个国家的义务。

法军在贞德的鼓舞下，连续收复了吉昂、贝塞尔、特鲁瓦和夏隆等地。然而贞德的战功与声望引起了宫廷大臣们的不满和嫉恨。当贞德坚持要国王向巴黎进军从而光复整个王国时，大臣们从中阻挠，他们在国王面前夸大贞德计划的危险性，9 月 8 日，贞德的腿部负伤，从而使进军巴黎的计划进一步受挫。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到处散布谣言，他们称贞德为女巫。像英国人一样，勃艮第派有理由憎恨贞德。她难道不会把转舆论，使之有利于查理七世吗？于是勃艮第人一直在寻找机会置贞德于死地。

1430 年春，贞德由于进军计划被拒，决定采取单独行动。她征集了一队士兵，又打听到勃艮第公爵在攻打贡比涅，便率军前去支援。不料勃艮第人玩了一次阴谋，贞德不幸落入他们之手。勃艮第人立即把她交给英国人。

英国人策划了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他们通过贞德来贬低太子查理这位小得可怜的国王的权威。于是英国人召集了有教会和大学参加的全体大会，控告贞德耍弄巫术，他们专门选择了法国籍的法官，并且广泛宣传辩论内容。神学院的知名人士到鲁昂来判处贞德。而贞德临危不惧，她大声地说，是天使的声音告诉她，要她去解奥尔良之围的。虽然贞德的躯体在烈火中永远消失了，但她的殉难却将促进法国人之间的和解。

贞德虽然牺牲了，她的精神却留在了法国人心中。法国抗战的胜利是和贞德的名字分不开的，为纪念奥尔良女郎，法国各地建立的新部队都起来赞助布尔日国王。原先一直与查理七世作对的勃艮第此时也一改初衷，两个法国于是达成谅解，阿尔马雅克拥抱了勃艮第。

1435 年签订了阿拉斯条约之后，法国除去了后顾之忧，光复巴黎就有了保障。巴黎居民早已厌倦了英国人的占领，于是城里像欢迎解放者那样迎接

统帅里什蒙的大军。次年，在勃艮第的帮助下查理七世收复了巴黎。

兰开斯特王朝由于国内困难向法王要求停战。从 1444 年至 1449 年双方休战五年，1449 年，当战争重新开始时，查理七世已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因此他毫不费力地击败了英军，收复了整个诺曼底。至此，胜负之态已定。

最后，在 1453 年，法军大举反攻。英国此时内部发生了分裂，红白玫瑰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因此英军力量大为削弱。两军在卡斯蒂莱展开激战，法军不仅装备精良，战术亦有改进。所以英军不幸失利了，他们的指挥官塔尔博也在战斗中阵亡，法军于同年 10 月占领了波尔多。

由于作战者消失，百年英法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但英国没有签订条约，他们还占据着加莱，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卷土重来。

人们往往认为 1453 年是百年战争结束的标志。然而真正结束它的是查理七世之子路易十一。路易十一在继承父业后，开始着手迫使勃艮第交还它从前夺去的土地，但要打败勃艮第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英国人被驱逐出去之后，勃艮第是法国最富庶的地方。它的行政机构十分有效，有公爵参事会、审计院、一群官吏和一支正规军队。1467 年，大胆查理继承了勃艮第爵位，他准备娶英王爱德华四世之妹为妻，这样英国和勃艮第有可能重修旧好，共谋对付法国。结果不出所料，爱德华四世与勃艮第结成了联盟。

但 1475 年，大胆查理遇到困难，阿尔萨斯人起来造反，瑞士人侵入了弗朗什·孔泰。查理不得不占领洛林，兵围南锡，由于该城将士死守，查理在攻城中竟然阵亡，这样路易十一便奇迹般地有了获胜的契机。路易十一在查理死后，便一鼓作气攻入勃艮第，夺得了勃艮第公爵国和马尔卡迪。之后，他又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奥尔良家族的路易和波旁家族的继承人皮埃尔·德·博热。这样，路易十一很有耐心地，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法国的统一大业。只有极少数地区未包括在内，如布勤丁厄和东方各省。

在比基尼条约签订后，百年战争实际上已告终结。大胆查理一死，这场战争更是彻底地结束了。路易十一完成了他的复国宏愿，至于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重振法兰西，这个功业就只有靠他的后代去实现了。